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6.04.004

#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交融

## ——第 6 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述评

李小平 揭筱纹 罗 莹

(四川大学商学院)

**摘要:**第 6 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以“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为主题,将全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发展嵌入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相关问题中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结合近年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进展,就大会主题报告、青年论坛、分论坛讨论的相关内容,从“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管理、本土管理的国际化视域、中国管理的国际化发展”3 个维度展开述评。

**关键词:**“中国·实践·管理”论坛;国际化;中国管理;本土管理

**中图法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6)04-0498-07

###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 ——Review of the Sixth Forum of China · Practice · Management

LI Xiaoping JIE Xiaowen LUO Yi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e sixth forum of “Chinese,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is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rough embedd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to the related issues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cholars attending mad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Combin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management with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scholars made reviews from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China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Domestic Management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agement”, by plenary lectures, youth forums, sub-forums, and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s.

**Key words:** China · Practice · Management Forum;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Chinese domestic management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引入西方现代管理的体系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长足发展。探索中国管理研究的学术界和践行中国管理实务的企业界,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占主导的语意场景中,历经了学习、借鉴、模仿的过程。30 余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西方管理理论是否能完全指导中国管理实践一直引人深思;另一方面,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也在沿用学习西方理论中不断探索并取得发展创新。

目前,我国管理学界已认识到中国的管理

理论必须植根“中国情境”的重要意义。早在 2004 年 8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简称管理科学部)就提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中国管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郭重庆<sup>[1]</sup>在 2008 年曾呼吁“管理是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毋庸置疑,我国管理研究与实践中两个导向的问题依然存在:①盲目搬用西方管理理论,基本忽略中国文化根基与现实情境对管理理论及技术的影响;②部分学者、部分领域过分倚重传统文化而忽视借鉴他人之长。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其引发的思维、行为变化,对以企业为主的经济

组织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客观情势倒逼中国管理必须在学理上认真审视“古今中外”的错综交织、交锋与交融。

相对西方管理学“内源管理现代化”，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则具有“外源管理现代化”特征，即中国的现代管理受西方现代管理的影响，从而引起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管理实践的变革<sup>[2]</sup>。当前，如何进一步落实“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方针，反思并总结我国管理研究现状，促进国内学者植根本土文化谋求创新、拓宽国际视野效法先进等，是当下学界与企业界所应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四川大学商学院联袂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报杂志社共同主办第6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要旨。本次论坛将学界与业界面临的管理问题置于全球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发展的视域之下，对全球普遍关注的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于客观反思、辩证借鉴西方理论，正向推进本土管理研究与实践的持续发展乃至创新突破具有重要意义<sup>[3]</sup>。

## 1 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管理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管理理论，通过模仿与借鉴，将有关理论用以实践之中。在学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不相融合，应予以否定拒绝；还有学者则主张中国的管理实践应直接沿用西方管理科学，因为“管理科学”完全诞生于西方。汪应洛<sup>[4]</sup>提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管理现实问题而诞生的，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融合，应着重强调它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的普遍应用性。我国管理学科当前的发展需要在跟踪国际研究前沿的同时充分考虑管理实践中所提出的需求，致力于解决我国管理存在的实际问题是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与使命，需要研究者更多关注“中国式”的管理问题<sup>[4]</sup>。关于我国管理学研究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相关问题，武汉大学谭力文、西北大学刘文瑞在本次论坛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方现代管理学对我国管理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章凯、四川大学徐玖平则将国外理论嵌入中国的具体情境、具体问题，就“创新发展地”综合运用理论并结合中国情境如何解决具体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谭力文通过梳理中国引进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脉络，论述了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管理思想

及其理论框架对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与实践的积极作用。他强调：“将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外经典管理理论相融合仍然是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的重要依托。”刘文瑞提出了我国当代管理演进的4个象限：①西法中境，指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管理实践中，这是我国管理学研究乃至实践过去近30年发展的主要路径；②西法西境，指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的情境；③中法中境，指我国传统管理的情境，正在经历变革，或者需要在坚守中不断发展；④中法西境，相关景象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也应是中国管理学者对全球管理的贡献与责任。

DRUCKER<sup>[5]</sup>曾多次强调，要使员工承担起责任和有所成就必须使工作充满活力，促使员工通过自己的工作提升成就感，同时让员工对自己严格要求与约束。鉴于此，章凯根据中国与西方的人才管理不同之处，针对全球化时代的企业人才管理问题，提出两种现象：①我国企业管理者在领导西方员工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刚性的文化冲突；②西方在华企业在管理中国员工时形成相对较弱的文化冲突。章凯所提及的这两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生搬硬套西方管理理论不能有效指导我国企业管理实务。

管理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与归宿，因此，实践导向管理研究要求学界与业界一起直面中国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对中国当前的发展产生实际的推进作用。正如卡斯特所言，“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试验场，如果这场试验失败了，也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失败”<sup>[6]</sup>。本次论坛中，徐玖平以我国当前建设中的多个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为实例，探讨了综合集成管理理论在项目管理中的运用实践。他以实际考察与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前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8个难题，提出了“多模式多项目调度平衡、多层决策主题土方调配，枢纽联合通航协调控制”等解决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所涉及难题的破解策略。在此基础上，徐玖平还从学理上提出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的“5个公开问题”，这些问题既为水利水电项目管理研究规划了选题框架，也为其项目管理实践提供了操作参考。中国管理实践为管理研究和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许多管理学理论都是从组织管理实践中诞生，管理学者也应更多地为企业管理服务。徐玖平基于工程管理实践来探讨管理理论方法，是推动现代管理理论研究 with 工程建设实践融合发展的一个好的尝试。

中国的管理必须根植于国际化的背景中，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管理学理论发展路径去向问题,本次论坛中,谭力文围绕历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所探讨的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管理学者、尤其是国内的青年学者应深入学习经典管理理论,广泛参与具体管理实践,否则难以准确全面地认识管理学的学科特性。

## 2 本土管理的国际化视域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管理的演进,带有强烈的西方语境。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因为东西方文化情境的差异,照搬西方管理理论与范式无法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管理环境。马夏尔尼在1794年就提出,“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了”<sup>[7]</sup>。我国与欧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上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若完全生搬硬套以西方文化为根基的管理理论,必将导致实践上的严重问题。鉴于语意、情境的不同,我国管理学者在研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对管理原理的理解会出现偏差,也可能导致管理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差强人意。李垣等<sup>[8]</sup>指出,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应在借鉴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我国加紧实现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纳入考虑范围之中,同时融合我国传统文化与特殊的企业制度,依托科学严谨的研究范式,独立而自信地去开展。在中西对话交流中,我国管理学者逐步认识到:因为中西文化存在诸多差异,管理科学的研究仅仅依靠西方管理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进一步思辨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管理思维与方法上的分歧。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其他诸多学科发展进程相似,需要“国际化”管理影响本土管理“变化”,并不断“强化”本土管理,逐渐“本土化”中国管理的阶段。只是这个“本土化”并非画地为牢,还兼取了西方管理理论精华与管理实践的经验,是基于特殊中国情境之上的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萃取。显然地,“本土管理”已然超越了地理概念,其本质在于强调由本土所产生的管理观念及方法。在已经熟悉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必须得到观念上的重视与内容上的发展。在本次论坛上,清华大学罗家德等学者将本土管理问题置于国际化视域之中,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刘文瑞通过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来研究中国管理的发展,强调管理学科在我国要想取得

大力发展,就需要管理学者结合中国情境,基于中西方对比,找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以西法整理国故,以西法批判国故,以西法弘扬国故,以西法解释国故。有学者曾提到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目前进展存在不足。例如,在2010年前顶级英语期刊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中,其中只有3篇高度反映了中国特色,有2篇关注“关系”的概念,另一篇与市场转型有关。在本次论坛中,罗家德探讨的“关系圈子”便是一个具有典型“中国情境”的话题。罗家德<sup>[9]</sup>认为,关系与圈子无处不在,世俗人情的关系理念深深嵌入了中国文化基因之中,“去关系化”的原始社会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难以持续。正如黄光国认为中国是“关系主义”社会;费孝通也认为关系分亲疏远近、内外有别,具有“差序格局”;梁漱溟更将中国称为“家伦理本位制”社会,认为中国人偏向于将家庭伦理扩大化,用不同的交往法则对待不同的人<sup>[9]</sup>。事实上,这种构建圈子的特殊性也促使大家更易于创造人际关系结构以寻找机会,从而更擅长于从事创业活动。陈明哲认为,“关系”这一概念应当重新梳理,主要解决两个要点:①将中西方“关系”的概念联合在一起;②要将“关系”这个概念延伸到实践,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sup>[10]</sup>。

在管理研究中,管理学者发现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也具有其独特之处,起源于欧美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无法完全适用于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在本次论坛上,四川大学陈维政以从西方引进的工会制度为对象,讨论了工会角色冲突如何影响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陈维政指出,中国企业工会的作用不同于西方工会,西方的工会在劳资纠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企业的工会在劳资纠纷等困境中却经常缺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工会所扮演的三重角色所导致:①维稳角色(政府角度);②维序角色(企业角度);③维权角色(员工角度)。章凯针对中西方企业人才管理的差异,对当前我国企业所进行的人才管理活动提出了两个需要深思问题:①寻求有效提升我国企业人才管理水平的途径;②寻求有效提升本土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水平的途径。章凯表明,要想从本质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应当着重研究文化与人性,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人性和致力于实现的个人价值。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企业的日渐繁荣,中国管理学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与发展的条件。探讨具有中国特

色的管理,形成中国式管理和营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正逐渐成为中国管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发展方向除了解决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问题外,更长远的价值贡献则在于中国管理实践对全球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君咨询董事长王明夫认为,全球格局的变化——西落东升、中国复兴以及文明换代,工业文明转变为信息文明这两大趋势对中国企业的兴衰和管理实践将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企业应放眼世界,融汇文明。时代的发展向管理学者和企业实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更具宽阔眼光,以迎接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的挑战。

章凯在本次论坛中指出,我国管理学者的首要使命应当是探索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念+方法”管理学范式,而不是依托西方的主流管理范式来开发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管理学需从中国文化传统、西方管理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上寻求结合点以期发展。要使中国的管理学具有发展后劲就要处理好管理思想演进中的“中”与“西”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我国管理学在对待西方现代管理理论问题上,一直未能寻求到协调中西关系、交融中西思想的有效方法,从晚清的“中体西用”到当前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都或多或少隐含着中西思维上的对立,如何使“中体”与“西化”走出对立,是我国未来管理学发展的重中之重<sup>[1]</sup>。本次会议上,刘文瑞提出,管理思想的中西研究应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在“西法+中境”基础之上精炼出有如“差序格局”类似的中国管理理论,在“中法+中境”基础上进行升华,使中国的管理思想在未来以“中法西境”的方式走出去。

郭重庆<sup>[2]</sup>认为,管理科学是致用的科学,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要谨防不要被国外的领头大哥带偏了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应突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近几年来,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主题的理论研究、“自信而独立”的实践开展都取得了持续进步。“中国的管理实践是管理理论的基础,更是管理理论的‘致用’对象”。管理科学部陈晓田在本次论坛中论述了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管理研究应当面向实践,着力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从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资源相对不足的现状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

的扭转,作为致用科学的管理学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应该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作为企业管理实践者的代表,成都科衡环保公司董事长张克江这样表示。本次论坛上,张克江以加拿大某污染评估及修复项目为研究案例,讨论了智能计算应用于环境风险管理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生活方式变革与社会环境系统的内部耦合”应是未来具体管理实践的努力方向。该项目主要由华人团队承接,是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的一次良好表现。

本次论坛中,管理学者们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在为中国企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为探讨“中国情境”的管理实践问题创造了充裕的研究课题。王明夫提出,在大数据时代,管理不再是单以人为主体,对人和物进行的管理,也是以物为主体对物与人所进行的管理,还包括“无人化”、“无组织化”的管理。华南理工大学陈春花针对管理模式发生变化的大环境,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下,已传承了百余年的管理理论和理念是否已经过时?”的问题。在同与会学者的探讨中,她指出,由于全球化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改变,互联网技术会对管理形成强烈冲击,组织创造价值的关键是清楚认识组织中每个成员创造力激发与其有效协同所带来的效应。适应互联网发展新趋势依赖于3种动力:即可持续性与创新力、技术发展所催生的新的组织形态、人们价值观的转变。

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促使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路径和创新模式的形成。直方大创新中心创始人许正以在工业互联网时代下我国应该如何探索转型发展路径为切入点,通过比较美国与德国的工业发展进程,提出“应当从更宽广的视角出发来寻求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发展创新的核心是智能服务,主要表现为在人、物与服务之间建立起智能互联、分析与决策的关系。回顾世界工业的发展历程,先后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子信息、自动化时代”,当前的第4次工业革命则是使得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工厂成为未来制造的主要形式,这一系统即为CPS。要成为工业互联网企业需要具备雄厚的转型能力以重塑管理体系。许正强调,在互联网时代下,围绕数据这一核心,我国企业的转型发展需要牢牢把握效率提升和模式创新这两个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工业互联网时代下企业与客户共创

和快速迭代这两大创新方向。

### 3 中国管理的国际化发展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发达经济体艳羡中国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将中国视作榜样,迫切地想要追随中国的脚步。经济实力迅猛提高的中国,软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兴趣;中国的发展模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对象……那么中国的管理研究与实践又将何去何从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明哲总结为4个字:“跨越、回归”,即跨界走到西方去,然后再回归到本土<sup>[10]</sup>。学术本来没有国界,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实践,需要向全球先进的管理研究与实践学习;反之,中国的管理研究与实践也是全球管理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组成,为其贡献理论价值、提供实践经验。DRUCKER<sup>[5]</sup>曾说过:“总会会出现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的分水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提出:“‘十一五’规划中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便是要在未来10~20年中逐步积累建立中国管理学派的学科基础。”由此,一些管理学者将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确立看成是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分水岭。

发展中国管理学,让西方管理学由范本变为参考,这需要国内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不断探索并逐步构建起属于我国特有的管理场域。在管理学研究领域,“道本管理”作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的独特力量发挥着积极作用。“道”作为中华文化最核心、最崇高的概念,是自然界与整个人类社会所有规律的统称,“以道为本”是人类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与有限的知识作为主要出发点的思维方式转变为以自然界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为主的思维方式,这使得管理者从“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的意识中脱离出来。“道本管理”就是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的和谐规律、人性的规律、人类科学发展的规律,使人类在客观的自然界规律约束下进行企业管理<sup>[13]</sup>。南开大学齐善鸿表示,“道本管理”的实质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客观的管理规律;企业文化需要尊重人性的规律;加强人类的主体性来消除管理的异化性,加强文化管理有助于提升我国软实力,增强我国数千年来所传承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强对人性价值观的认同,这是我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必要途

径之一。

只有不断进行自主创新,我国管理学才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管理学,或者是有学者所言的“管理学中国学派”。综合本次论坛各位学者的观点,这个“中国管理学”的标识有二:①有中国文化基因的价值传递;②有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示范,单就这一层面看,“中国管理学”已然形成。发展中国管理学主要有3个要点:①中国特色,即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现状为基点,立足于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②问题导向,即从我国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来发展中国管理学;③以国际化的视角看待中国问题,形成中国实践。当前,已有学者在开创中国管理理论的进程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都有一定共性,那便是将中国情境作为构建管理理论的因素之一,或者以中国情境信息为基础搭建理论,如苏东水、成中英、成思危等学者所提出的中国管理理论<sup>[14]</sup>。

管理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科学精神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sup>[15]</sup>。针对这个话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欧阳桃花与中南大学沈超红在本次论坛上对此做了相应探讨。欧阳桃花通过案例与企业实践、学生培养、学术研究3个方面作为展开本次探讨的切入点,研究了管理学者具有的情怀和理念,她指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聚焦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这3个方面,从而实现三位一体,进而达到发展和突破。谈及管理学者在目前所面临的“分散易、聚焦难”的普遍性问题时,欧阳桃花强调,聚焦应成为管理学者的重要能力之一,获取这项能力的关键是明确所研究的问题内容与厘清整体研究思路。理论视角应包括资源整合、生态系统、跨边界和商业模式;分析重点则应聚焦于组织结构、组织二元性产品开发流程、创新生态、资源能力;研究情境主要划分为有关概念情境,如生态系统+商业、科技、创新、创业;研究核心则是创新生态系统。欧阳桃花认为,管理学者自身认知与其研究能力互为因果:前者对后者具有导向作用,后者又能进一步升华前者。沈超红认为,现有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①应将成功与失败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从而减少结论可能导致的偏差;②研究方法上应开展纵向研究,以确认企业在不同阶段、维度上的权重与绩效形成机制。欧阳桃花与沈超红的上述观点对于我国管理融入全球具有启发性意义。

哈默尔<sup>[16]</sup>提出,企业的创新不仅仅停留在

传统意义的开发新产品或采取新技术的层面上,而是要跳出这个局限创造出“新概念”。鉴于此,企业要主动创造“新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吴晓波曾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论坛中提到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和本土化。这是管理范式的转变。在本次论坛的“管理理论、方法与范式创新”分论坛中,上海大学刘祯回顾了传统管理理论,探讨其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启示;东北大学赵希男在新环境下分析重构经典理论;重庆大学白胜探索了如何中西结合谋求管理创新。该分论坛中,多数学者探讨的重点都聚焦在如何结合具体研究与管理工作展开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管理与全球管理的互动融合等话题上,“创新”这一时代旋律在本届论坛上得到了很好的呼应。

管理学的研究进程应当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匹配,这也是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目标与管理学者努力的方向。在本次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宋继文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探索之路做了回顾和展望。在回顾“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发起背景与历年“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主要议题的基础上,宋继文通过文献分析指出我国管理学研究在主题与内容方面的发展趋势:①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持续稳定的增加,且在论文数量及增量上总体高于中文论文;②中国大陆与中外合作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多;③微观类论文数量增幅较大,占比远远大于宏观类论文;④融合了中国制度与环境的论文数量呈下降趋势;⑤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文献在2012年达到峰值,而关于创新与创业主题的论文呈递增趋势。宋继文强调,中国管理研究在方法和体系上应与国际接轨,并注重探索学科价值来推进本土管理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依靠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但是随着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的推进,不断涌现出了融合中国本土特色文化与具体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在与国际管理科学的比较与对话中,探索独特的中国情境,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进行理论创新,已经成为管理学者的历史重任。对此,管理学者逐步认识到无论是“国际化下的中国管理理论”,还是“本土管理理论的国际化发展创新”,都需要对管理实践所嵌入的情境进行界定和解构。逐渐深化对中国情境的认知,将促进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实践与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研究实践的对话,这也决定着中国管

理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当下,国内管理学界已经逐步明确了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对于我国管理理论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在确认中国独特的文化情境在构建中国管理理论中的价值贡献的同时,对中国情境本身的认知也逐渐从被动承认向主动揭示转变。对于如何推进我国管理国际化进程的具体问题,一些学者在论坛上也有明确的观点。例如,陈春花指出,“回归本真”是我国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需拥有的态度与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注重采用全球通用的语言、规范科学的方法,更容易达成“将个性问题升华为一般理论问题”的目标。中国的管理研究在“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的同时,也有信心并应当“接着中国管理国际化讲”。

为聚焦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新应用、现代管理的中国发展等问题,本届论坛还设立了“中国管理研究与探索”分论坛,从现代管理的中国情境以及具体实践角度展开讨论。如果说王明夫等企业界人士是中国管理学派的企业代表,那么暨南大学孙东川则是促成中国管理学派形成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的学界代表。在本次论坛中,孙东川提出,“改革开放30年是管理科学‘洋为中用’的30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已表明:创建现代管理科学派的中国学派时机已到,“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它应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希望,中国人应该成为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主体,不能重演“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学是日本的”的悲剧。南开大学古志辉则以文化会影响经济绩效为理论预设,研究了儒家传统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观各位学者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本土管理应植根于本土文化,并应与国际管理研究与实践有交流互动,尤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前,中国的管理研究已经且在未来更要对全球管理理论有所贡献。“青年论坛”是本届论坛的创新点之一,与会的青年学者们围绕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就在研究中“如何找寻问题、设计研究、撰写论文”等话题各抒己见,并与刘文瑞等学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展示出未来中国管理发展的新动向与新力量,也预示着中国管理的新发展与新趋势。

#### 4 结语

本次论坛汇聚了诸多关注中国管理研究与

实践发展的专家,就涉及“中国情境”管理与前沿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与会学术界、实践界通过对中外典型研究文献的回顾,以及具有“中国情境”管理实践的分析,不断自我修正与丰富发展着中国管理的实践路径。通过本次论坛可以看出,在管理科学部提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中国的管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后,我国管理学者越发重视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并且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开始结合“中国情境”研究管理,有力促进了本土管理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

中国管理走向国际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对西方了解不够,而是对自己的了解不足。通过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交流互动,对国内外持续关注与研究的“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系统的、科学的、规范的探讨,推动了更多的管理学者关注国际化视域下的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了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管理学发展到今天,必须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正如郭重庆<sup>[1]</sup>所多次强调的,“管理学中国化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古为今用不复古,洋为中用不媚外”,近年来我国本土管理的探索与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发展中所呈现出的问题也应受到重视。在研究与实践上,还存在“非此即彼”的困境,还需要做好“中西结合”的平衡。中国管理研究应当以中国情境为基础,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一般管理理论,进而促进管理实践的发展。植根中国文化与具体实践土壤,探索全球思维与管理实践的交叉融合、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将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未来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应自信地置于中国情境之中,积极为全球管理贡献理论价值与提供实践经验。

#### 参 考 文 献

- [1]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 管理学报, 2008, 5(3): 320~322
- [2] 罗珉. 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J]. 管理学报,

2008, 5(4): 478~482

- [3] 李小平. 根植本土文化 拓宽国际视野——第6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2015)纪要[J]. 管理学报, 2016, 13(1): 29~32
- [4] 汪应洛. 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与创新[J]. 管理学报, 2005, 2(1): 1~3
- [5] DRUCKER P F.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93
- [6] 陈春花, 宋一晓, 曹洲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管理学报, 2014, 11(3): 321~329
- [7] 李京文, 关峻. 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方向之管窥[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1): 4~7
- [8] 李垣, 杨知评, 王龙伟. 从中国管理实践的情境中发展理论——基于整合的观点[J]. 管理学报, 2008, 5(4): 469~472
- [9] 罗家德. 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J]. 管理学报, 2012, 9(2): 165~178
- [10] 本刊编辑部. 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 对陈明哲的访谈[J]. 管理学报, 2016, 13(1): 1~6
- [11] 刘文瑞. 西学东渐三十年——管理学在中国[J]. 新远见, 2010(9): 73~79
- [12] 郭重庆.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跻身管理科学前沿——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虑[J]. 管理科学学报, 2012, 15(12): 1~9
- [13] 齐善鸿, 张党珠, 邢宝学. “以道为本”的企业文化内涵及生成机理研究[J]. 管理学报, 2013, 10(4): 488~493
- [14] 张晓娟, 王磊. 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回顾与展望——“管理学在中国”2013年会(第6届)述评[J]. 管理学报, 2014, 11(2): 181~189
- [15] 徐淑英, 吕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对徐淑英的访谈[J]. 管理学报, 2015, 12(3): 313~321
- [16] 哈默尔 G. 领导方式变革[M]. 曲昭光, 赖溟溟,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 48

(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 揭筱纹(1957~), 女, 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商学院(成都市 610065)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区域经济。E-mail: jiexw@vip. 163. com